

丁有國

張廉卿詩文注釋

上冊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

014008553

I222.752

02

V1

丁有國

張廉卿詩文注釋

上冊

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

I222.752

02

V1



北航

C1696313



丁有國先生，一九三三年出生，原籍湖北蘄春縣，一九五二年由中師畢業後參加教育工作，一九五九年離職考入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，一九六三年秋季畢業，分配到華師黃岡地區函授站任教師。先後擔任過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的校長、鄂州市廣播電視大學教務處長。一九八七年被評為副教授，講授古代文學、古代漢語等課程。兼任鄂州市詩詞學會副會長、鄂州市張裕釗研究會副會長、鄂州市楹聯學會副會長。曾主編《鄂州詩詞》四期、《鄂州市志》、《論學手劉助讀》，點校了《武昌縣志》，並擔任過《鄂州人物》、《鄂州新四軍革命鬥爭故事》等書副主編，有詩集《鄂渚吟痕》、《鄂渚吟痕續集》。二〇〇七年，受聘擔任續修《鄂州市志》主編。



張廉卿像

張廉卿先生遺像

濂亭遺詩

光緒乙未遵義黎氏刊

濂亭遺詩刊本書影

濂亭文集

光緒二十四年大
治黃氏刊於關中

黃肇宏題



濂亭文集刊本書影

濂亭遺集

守敬題

送黄蒙九序①

注：

①黄蒙九，清随州（1912年改为县，今湖北省随州市）人，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丙午），与张裕钊、范鸣珂、范鹤生等在湖北省乡试中同榜中举。同治年间，在江苏省通州（今南通市）任知府，后又兼任海州（今连云港市西部）知府，两处都有政声，但事与心志不合，辞官离去，上官留之不住。张裕钊作此序相送。后在张裕钊老家设馆授徒，于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，死于馆舍，张裕钊为之殓殓。

②易曰：“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。”见朱熹《易·系辞传上》第八章，引孔子的话：“子曰：‘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；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；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。’”臭的本义是一种气味，可以是香，也可以是臭，此指香。

③ 见《孟子·公孙丑章上》，孟子在回答他的学生公孙丑提出的问题：“伯夷、伊尹何如？”孟子说：“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；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，孔子也。”此处“仕”指作官。

④ 太甲：成汤长孙，既立三年，不遵汤法，乱德。伊尹为相，放之于桐宫（离宫）。三年后，太甲悔过自责，变善，伊尹迎之，还政告归，并作《太甲训》三篇。事见《史记·殷本纪》。

⑤ 成王：武王崩，成王年幼，武王弟周公摄政。其时为了不使商纣王绝祀，封其子武庚于殷，并使成王叔父管叔、蔡叔监督殷，而管叔、蔡叔勾结武庚叛乱，周公率军两次东征，大义灭亲，平定叛乱，并灭东方十七国，继续分封诸侯，兴建洛邑，作为中原统治中心，并建立典章制度，明德慎罚。作《大诰》、《无逸》等篇，奖励农桑，使民食充裕。七年后，还政成王，自己

序

由鄂州大學丁有國先生潛心研考、勤奮筆耕的《張廉卿詩文注釋》一書即將出版，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，可喜可賀！

張廉卿博覽群書，精通經史，篤志於古文辭，成爲桐城派末期之傑出者，其文名聞於海內，慕其聲望而私淑者，亦大有人在。《清史稿》編纂者王樹枏（楠）在《贈張廉卿》詩中稱：「吾愛張夫子，文章海內師。」《清儒學案》評他的文稱：「段涂於韓歐曾王，上推晚周先秦盛漢，原本六經，沈潛於許鄭之訓詁，程朱之義理，以究微奧。」他對文章之法提出了精妙的見解：「文以意爲主，而辭欲能副其意，氣欲能舉其辭。譬之車然，意爲之御，辭爲之載，而氣則所以行也。欲學古人之文，其妙在因聲求氣，得其氣，則意與辭往往因之而益顯，而法不外是矣。」（《答吳至甫書》）這在當時，對那些致力於文章學問的人，有着積極的影響。

張廉卿的詩歌，最能反映他的政治觀念、道德情操和人生態度。這裏僅就其愛國思想方面談一下。中國古代的優秀作家，其作品所反映出來的愛國思想，往往同忠君思想是聯繫在一起的，張廉卿也不例外。他憂傷時事，同情人民，也同樣憂其君。在外患內憂、朝廷處於困境的時候，他「獨念皇家一愴然」（《眼底》），「獨憐閭閻上，吁食問共球」（《弱水》）。在清朝末年，國勢處於「江河日下作深淵」（《眼底》）的形勢下，張廉卿的愛國思想，

更多的是表現在憂愁和哀嘆國家的衰危方面。他一生嗜酒，但當想到國事如「崑崙欹傾九河翻」的時候，便「念此對酒不能飲」（《是日歸來復得長句更呈李佛生》）；他面對「滿眼山川忽變秋」的殘敗景象，「夢魂常抱杞人憂」（《悲秋》）；在陽光和煦、景色宜人的春天，尤其是在「江南二月春光好」的季節，對張廉卿來說，也不是賞心悅目、精神舒暢，而是「春光歲歲復年年，愁人夜夜達旦旦」（《傷春》）；他嘆息：「萬事悠悠無可說，一心耿耿有誰同？」（《百年》）直至七十一歲的時候，他還沒有忘懷國事，感嘆「貪污成俗國維破，砥柱無人士氣孤」（《逝影》）、「滿眼風霜侵暮景，回頭哀樂愴中年」（《不眠》）、「議和議戰國如狂，目論紛紛實可傷」（《孤憤》）等，都表明他「未能一日以忘斯世」。張廉卿的一些憂傷國事的詩篇，表現出了一種沉鬱孤耿的氣質，形成了自己詩歌的特色，有其獨特的個性。

張廉卿的書法能融貫前人之精華，領悟其率真之處。他悉用中鋒，主以濃墨，「中筆必折，外墨必連，轉必提頓，以方爲圓；落必含蘊，以圓爲方。故爲銳筆而實留，故爲漲墨而實潔」（《廣藝舟雙楫·述學》）。其體式外方內圓，疏密相間，自成一家，在清代書法家中，他是一位傑出的具有改革創新精神的大方家。康有爲在《廣義舟雙楫》中曾贊道：「湖北張裕釗，其書高古渾穆，點畫轉折，皆絕痕迹，而意態通峭轉甚，真能甄晉陶魏，孕宋梁而育齊隋，千年以來無與比。」比張廉卿長十歲的著名文學家劉熙載稱贊道：「先生文章爲當代之冠，書法則本朝一人耳。」張廉卿的日本學生宮島大八之父宮島栗香，所作詩句也說明了這一點，詩云：「朦朧不載金州物，只載廉卿四幅書。」意思是從中國歸來，船上所載中國物產祇要有張廉卿的四幅墨迹就足够了。這充分說明當時的中外學者對張廉卿書法的欣賞與喜愛。

張廉卿的詩文，盡爲文言文，而且用典較多，一般人很難讀懂。丁有國先生多年帶病堅持注釋，爲傳承張先

生的文學遺產、弘揚祖國的傳統文化，作出了應有的貢獻！在《張廉卿詩文注釋》出版之際，丁先生要我為該書寫一篇序文。我出於對丁先生的崇敬，也為他的敬業精神所感動，欣然應允了，於是為序。

湛有恒

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於「梅竹書堂」

（本序作者湛有恒為湖北省張裕釗研究會副會長）

前言

張裕釗，字廉卿，號濂亭，清末著名散文家、書法家、詩人，湖北武昌縣（按：清代武昌縣，民國時改名鄂城縣，即今鄂州市）符石鄉龍塘張村人，生於道光三年（一八二三）農曆十一月初四日酉時，卒於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正月十四日午時，享年七十二歲。他七歲入私塾讀書，誦讀四書五經，及長，不樂意於制舉業，喜歡讀曾鞏（子固）的文章，因而經常私下誦讀《南豐集》。道光十八年（一八三八），十六歲，應縣試，中秀才。道光二十六年（一八四六），二十四歲，赴省城應鄉試，中舉人。咸豐元年至京城，考授內閣中書。當時，主考官曾國藩很欣賞他的文章，並派人約他見面。《清史稿·張裕釗傳》中有這樣的記載：「曾國藩『賞其文，既來見，曰：『子豈嘗習子固文耶？』裕釗私自喜。已而，國藩告以文事利病，及唐宋以來家法，學乃大進。』從此，張裕釗出於曾門，後與吳汝綸、黎庶昌、薛福成同稱『曾門四弟子』。曾國藩在《求闕齋日記》中寫道：「余門徒中可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。」咸豐二年（一八五二）農曆八月二十一日，他目睹清廷的腐朽，頹敗之勢已無法挽回，遂絕意仕進，辭官南歸。從此以後，他終生不仕，長期以講學爲業，先後應聘主講於武昌勺庭書院、南京鳳池書院、保定蓮池書院、武昌江漢書院、襄陽鹿門書院，教授學生達四十年之久，弟子三千，名人逾百」。直至光緒十八年，七十高齡，纔由其子後沆、後澹從襄陽鹿門迎養至西安。光緒二十年，卒於西安寓所。平生著述甚多，有《濂亭文集》八卷，《濂亭遺文》五卷，《濂亭遺詩》二卷，《論學手札》二冊，以及《左氏服賈注考證》和《今文尚書考證》等。

張廉卿以其畢生精力，在從事講學培植後進的同時，致力於文章學問，進行書法的繼承與革新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他講學的時間長達四十年之久，門生衆多，其中最著名者有范當世、張謇、朱銘盤、官島咏士（日本人）等，許多門生後來成爲學者、散文家、詩人或書法家。范當世，字肯堂，江蘇通州人。他從張裕釗學習古文，取法桐城，但不爲其所拘，後來成爲晚清桐城派古文家，也是「同光體」的著名詩人。《晚清四十家詩》的編選者吳闓生，在詩集中以范氏的詩冠首，錄其詩最多。范氏著有《范伯子詩文集》。張謇，字季直，號薈庵，江蘇南通人，光緒二十年中進士一甲一名（狀元），後來成爲現代立憲派，資本家，他在南通投資白銀四十四萬兩，建一座兩萬紗錠的紗廠，又開辦墾牧公司、輪船公司、冶鐵公司、淮海實業銀行、大照電燈公司等九大企業，官至江蘇諮議局議長，清政府曾賞他三品銜。辛亥革命後，任江蘇兩淮鹽政總長、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總長，著有《張季子九錄》、《張謇函稿》、《薈翁自訂年譜》等。朱銘盤，字曼君，江蘇泰興人。他長於文史，工詩與古文，爲晚清著名詩人，著有《晉會要》一百卷、《朝鮮長編》四十卷、《桂之華軒文集》等。官島咏士回國後，創立了「善鄰書院」，廣招門徒，傳授漢學，並重視傳授張裕釗的書法，因而在日本形成了一個張氏書派，其書道至今興盛不衰。官島咏士的後人至今還供奉着張裕釗先生的靈位。張裕釗博覽群書，精通經史，篤志於古文辭，成爲桐城派末期之杰出者，其文名聞於海內，慕其聲望而私淑者，亦大有人在。《清史稿》首席總纂王樹枏（楠）在《贈張廉卿》詩中稱：「吾愛張夫子，文章海內師。」並非過譽。《清儒學案》評他的文章的體與質稱：「段涂於韓歐曾王，上推晚周先秦盛漢，原本六經，沈潛於許鄭之訓詁，程朱之義理，以究微奧。」他對文章之法提出了精妙的見解：「文以意爲主，而辭欲能副其意，氣欲能舉其辭。譬之車然，意爲之御，辭爲之載，而氣則所以行也。欲學古人之文，其妙

在因聲求氣，得其氣，則意與辭往往因之而益顯，而法不外是矣。」（《答吳至甫書》）這在當時，對那些致力於文章學問的人，有着積極的影響。

張廉卿生活的時代，正是清政權風雨飄搖、江河日下的末世。英、法、日、俄等帝國主義國家，憑其砲艦之利，不斷地侵略中國，侵佔中國的領土，掠奪中國的財物。在封建主義、帝國主義的雙重剝削與壓迫下，中國人民紛紛起義。他們攻佔州縣，殺官濟民，尤其是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革命，席捲了東南半壁河山，建立了人民革命政權。義軍的英勇奮戰，先後達十三年之久，沉重地打擊了國內外的反動勢力。清朝統治者，對內，血腥鎮壓人民的反抗；對外，屈膝求和，簽訂了一系列的賣國條約，割地賠款，喪權辱國，致使國日貧，民日困。尖銳的階級矛盾、民族矛盾，使清政權有如大廈將傾。張裕釗感嘆自己生不逢辰。他在一首《放歌行》中寫道：「前有萬萬古，後有千億年，我生胡獨如此間？蒼天，蒼天高高上無極，使我心悲抑塞侘傺不能言。」他以敏銳的政治洞察力，清楚地看到了清廷的腐敗和衰頹之勢已無法挽回；因而，他從三十歲起，就一直絕意於仕途，擯棄功名利祿。雖然他的老師曾國藩由湘軍領袖進而當上了直隸總督，權重位尊，當時「出其門者多通顯，裕釗相從數十年，獨以治文爲事。」（見《清史稿》本傳）在張裕釗看來，當官並不是目的，而是要行其志，爲國爲民做一番事業。如果「道不行」，則「乘槎浮於海」。因此，要審時度勢，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仕則仕，君子之仕不仕惟其可焉耳，未嘗有意於其間」。這是他在《送黃蒙九序》中引用孟子的話以申述他對出仕的態度。他辭官不仕，更重要的原因是「自度其才不足以拯當世之難」（見《送吳清卿庶常序》）。同時，厭惡官場上的腐朽惡濁氣息，這也與他甘居澹泊、不求仕進有密切關係。他鄙視那些單純爲了「榮與利」而做官的人。他描述這種人，「其仕非欲盡行其志，大都以其

榮與利也；得志，則泰然其自恣，恤乎若恐自失；不得志，則輾轉拂胃，佗焉若不可終日」（見《送黃蒙九序》）。他在一篇《送吳筱軒軍門序》中，對吳筱軒勤於國事，經常處於「惴惴」不安的狀態，和「以誠自處，而以謙處人；勞則居先，而功則居後」的思想品德表示稱贊，而對於官場上的弄虛作假，和對某些搞軍務的人浪費巨資的現象表示強烈的不滿；對於公卿將相們爲了一句話、一點小事相互忿恨，而對於國家的奇耻大辱卻置之不顧等行爲，也表示強烈的義憤。同時，對官僚體制的「貪污成俗國維破」（《冬暝》）以及「萬事總爲浮僞敗」（《孤憤》）的現象，也是十分痛恨的。張裕釗不願意涉足官場，不參與政事活動，但是，他一天也沒有忘記政治，忘懷國事。他「退自伏於山澤之間，然區區之隱，則未能一日以忘斯世。其耳之所聞，目之所接，愴焉於其心」（見《送吳清卿庶常序》）。他對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強盜行爲，無比憤恨。而對於反抗侵略者的鬥爭，卻寄予殷切希望。光緒六年（一八八〇），清政府拒絕了中俄《里瓦基亞條約》，俄國派海軍到中國海面上示威。張裕釗的學生張謇隨從浙江提督吳筱軒，赴山東辦理軍務，準備決戰。張裕釗在《送張謇之山東序》中，希望張生「經武伐謀，料敵制勝，戮鯨鯢於東海……刷蕩國耻，張我皇靈」，並表示：「余日夜傾耳跂足以望之也。」對於如何反抗外國侵略者，他曾經從戰略上提出自己的見解：東南沿海，外國船隻輻湊，情況復雜，應該建節湖北，控制江之上游，以臨制東南，握樞要之勢（見《送合肥李相國督師秦中序》）。他憂傷時事，哀嘆國勢衰危的思想，在他的許多詩篇中都有所表露。他長期應聘在外講學，這固然是爲了培植後進；但是，由於家境窘迫，「藜藿養不足，飢寒驅離家」（《病起東汪梅村》），也不能說不是一個原因。他在四十歲的時候，感嘆自己「至今阮籍爲身謀」（《悲歌》），直至年屆古稀，仍以講學爲業，自嘆「老去萍踪任飄轉，杜陵狂客我宜雙」（《晚登聞喜亭》）。他長期

生活在下層，尤其是在太平天國起義軍與清軍在鄂境戰事頻繁、兵荒馬亂之際，他「十載竄山谷」，接觸了窮苦百姓，因而同情人民的困苦。他在一首《無題》中寫道：「吁嗟帝有醉，胡爲構此禍。吾生豈足惜，尚免戈爰荷。所悲蒸蒸民，焉得謝坎坷。」張裕釗在《送黎純齋使英吉利序》中，論述了中國自從明代中葉以來，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及西方的進化，說「西人善巧思」，器械火器進步，「天文、地理、聲光氣化之學」，研究得深刻。他們的舟車「窮極六合」。還用革新進步的觀點指出：「中國古代巢居穴處，茹毛飲血」，後來「制禮作樂，備物制用」，「秦廢先王之法，更立新制，漢唐之世不能易也。」在文章中論證了今日之中國，是從古代之中國革新變化而來的。他還以爲變革是不可抗拒的：「今日世變之大且劇，天實開之，人之所以不能違也。」他批評士大夫們「拘守舊故，鄙夷詆斥，羞稱其事（指西方的文明進化），以爲守正不撓。」這好像是「鷓鴣已翔於寥廓，而羅者猶視夫藪澤。」這種主張變革和學習西方的思想，在當時無疑是進步的。光緒十三年閏四月初一日，他在寫給吳汝綸的信中說：「聞都中至天津擬試辦鐵路，鄉舉及童試當增算學一門，風氣自此將日開矣。」可見，他對新事物的出現，是多麼欣慰；而對其意義的認識，又是多麼深切啊！然而，張裕釗畢竟是一位舊時代的知識分子，傳統文化思想在其頭腦裏佔主導地位，尤其是封建倫理觀念更爲濃厚。他讚頌貞女，頌揚節婦，這些都明顯地表現出了他的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。

張廉卿在教書育人的同時，致力於文章學問。他在古文寫作方面，與少年時期，熟讀《南豐集》，學習掌握曾鞏的文法有關。及長，又誦讀方苞、姚鼐的文章，學習桐城派義理、考據、辭章合一的爲文方法。他最下力氣學習的是司馬遷、揚雄、司馬相如、韓愈、歐陽修、曾鞏、王安石等人的文章。《清碑傳合集》中